

秦汉文学格局之形成

——曹胜高——
曹胜高 著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曹胜高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曹胜高 主编

秦汉文学格局之形成

——曹胜高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文学格局之形成 / 曹胜高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61 - 8980 - 1

I. ①秦…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①I20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756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张甲子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秦汉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格局之初成”（12BZW059）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国家建构与两汉文学格局的形成”（12YJC751005）
结项成果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袁行霈	王 宁	迟 铎	陈俊民
	赵世超	郭齐勇	朱凤瀚	刘学智
	林乐昌	王子今	贾二强	李继凯
	张新科	李 浩	党怀兴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为祥	王 晖	王晓鹃	周淑萍
曹胜高	黑维强		

主 编 曹胜高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曹胜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既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作为我们的历史传承；也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我们的民族标识。这些经验和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必然会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

研究古代中国，一是要以历史视角观察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更为理性地思考古代中国在国家建构、行政调适、社会整合、文化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清晰地揭示中华文明何以如此，将之作为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结论。有了准确的自我认知，便能以学术自觉推动文化自觉，广泛地参与未来全球文明的共建。二是要从学理角度辨析古代中国演进的规律性特征，概括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总结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作为世界秩序建设的理论支撑。有了清醒的文明定位，便能以学术自信支撑文化自信，全面地参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

这就需要当代的学术研究者，能以赓续中国学术的学脉为己任，以新的人文主义情怀面对一切历史经验、思想进程、文学创作，注重以新方法、新材料、新思路、新视野审视中国固有之学问，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推陈出新，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温故知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守正创新，以历时性的研究、共识性的成果，推动古代中国研究的不断深入。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编辑出版“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意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基本典籍与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重大关切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选取古代中国在文学、历史、哲学及艺术等学科发展演生

2 秦汉文学格局之形成

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致力总结其“所以如此”，而且着力分析其“何以如此”，资助出版一批具有前瞻眼光、原创意识、深厚学理的研究成果。我们期待与同道者合作。

2015年12月8日

目 录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主要研究思路	(2)
三 基本观点	(4)
第一章 帝道说与秦汉治道的形成	(10)
第一节 帝道说的学理建构与实践形态	(10)
第二节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的形态	(28)
第三节 帝道与“霸王道”的学理融通	(43)
第二章 秦制反思与西汉的改制思潮	(65)
第一节 王制论与周秦儒学的建制意识	(65)
第二节 “秦弃礼义”与秦礼之形态	(77)
第三节 “汉承秦制”问题辨析	(90)
第四节 改制语境与汉赋的劝百讽一	(105)
第三章 义政论与秦汉政论的理据	(125)
第一节 义政说的学理建构与学说指向	(125)
第二节 义兵论与秦汉军争的合法性阐释	(143)
第三节 西汉道义观的学理形成	(159)
第四章 国家想象与秦汉文学的批判情绪	(176)
第一节 君子制义与两汉士人的政治际遇	(176)
第二节 “公天下”与两汉国家秩序的理解	(189)

2 秦汉文学格局之形成

第三节 天下共治与两汉政论的直言	(204)
------------------------	-------

第五章 文学之职与制度文学的生成

(220)

第一节 秦汉“文学”职务的设立	(220)
第二节 两汉“文学”选用与升迁	(233)
第三节 郡国文学的运行机制	(246)
第四节 鸿都门学的历史误读	(257)

第六章 文学认知与两汉文学的独立

(273)

第一节 周秦文学认知的衍生与形成	(273)
第二节 讽诵之法与两汉讽谏机制的形成	(287)
第三节 两汉文学教化功能的形成	(300)
第四节 文学实践与东汉文学的形态突破	(315)

第七章 知识视阈与两汉文学格局的拓展

(333)

第一节 想象世界与中国文学空间的建构	(333)
第二节 讖纬观念与中国文学的表述模式	(347)
第三节 审美认知与汉魏诗歌的艺术品位	(361)

第八章 两汉文体的渗透与融通

(374)

第一节 骚赋新变与两汉文体的演进	(374)
第二节 赋法流播与汉魏文人诗的兴起	(383)
第三节 汉赋对汉代诗学的启发	(394)
第四节 汉晋诗歌的文人化路径	(404)

余论

(418)

参考文献

(428)

后记

(436)

绪 论

本书意在从秦汉国家建构的层面，讨论国家制度如何促成文学认知、文体样式和文学意识的形成，从“大传统”的角度描述秦汉文学“何以形成”；进而辨析秦汉社会形态、精神世界、民间情绪对文学想象、文学基调和文学表达的影响，从“小传统”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格局“以何形成”。

一 问题的提出

秦汉时期不仅形成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但秦汉文学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国家制度如何要求文学与行政运作相调适？作为精神世界的文学认知，如何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情绪的文学基调，如何随着社会思潮不断演生？这些关乎中国文学建构的基础性问题，恰是秦汉文学演进的关节所在，我们有必要深入讨论。

第一，从历史上看，秦汉的政治文化、行政习惯，构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基本框架，由此而形成的国家礼乐建制、文化活动、艺术形态等，促成了中国文学格局中最为基础的“制度文学”，即作为国家政治行为和行政运作的文学活动及其表达方式。诸多学者曾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等角度进行探讨，但对“制度文学”的形成及其作用模式缺乏详尽讨论，尤其是秦汉在帝制建构中所强调的历史经验、行政系统、管理秩序，如何促进“制度文学”的形成，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样式，亟须深入研究。

第二，从思想上看，传统研究多集中在儒学、经学的讨论上，无暇深入论及诸子学说在秦汉的延续与融通。先秦诸子思想在秦汉是如何分化并汇融？这些思想意识如何衍化进入其他学术体系？先秦的信仰和方术如何经过整合与重组，最终形成神仙谱系、巫术学说、神道观念？这些思想观

念，如何通过社会思潮构建了古代的精神世界？这些亦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理论展开讨论，深入分析其对神话理论的开创、对文学时空的拓展、对生命体验的理解等。

第三，从文学上看，尽管近年来对秦汉文学的研究有较大进展，但仍需具有更为尖锐的问题意识、拓宽更具立意的研究领域、探寻更为开阔的研究视角。郊庙歌辞、疏奏论策、颂赞箴铭、谏碑哀吊等，如何成为具有文学意义的文体？秦汉社会批判如何调整文学的基本功能？从制度需求、行政运行、社会交流和艺术审美等历史纵深中探讨，分析其作为帝制建构、思想表述和社会交流媒介的基础功能与附加意义，有助于理解秦汉何以成长出分工不同的文学样式，形成体系有别的文学形态。

因此，以制度建构、行政运作和社会认知为视角，系统梳理秦汉文体形态、文学基调、文学想象、文学功能和文学认知，能够描述出秦汉政治形态、行政制度、社会结构、文化需求对中国文学格局的建构过程，可以多维度地审视中国文学的形成肌理、演进线索和塑造环境，多层面地分析国家建构、行政秩序、社会情绪与精神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作用方式。

二 主要研究思路

第一，分析秦汉国家建构与“制度文学”的关系，讨论在国家层面如何通过制度的建构，整合秦汉思想观念、社会形态和民间信仰的关系；分析秦汉公文文学化的历史认知过程和创作实践过程；描述出文学服务于制度的基本模式、制度之于文学的主要影响。我们试图将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学史打通，分析先秦文体样式、艺术格调、语言习惯、表达技巧等文学性因素，在服务于国家制度建设、使用于礼乐活动的过程中，如何重组以适应制度要求而形成“制度文学”，并借此总结帝制形成期的文化需求对文学艺术的外在规范和内在驱动。

第二，在讨论秦汉社会精神与文学形态时，以民间精神生活和想象空间对文学认知的影响为视角，关注秦汉民间信仰和官方信仰的互动关系，利用出土简帛和画像石作为印证资料，对神话、小说乃至部分诗文的想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个案分析，历时性地考察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变迁及具体线索。研究秦汉思想、观念和风俗，既可以看到诸子思想如何经过官方主导变成社会意识，又能看到非主流的社会认知如何在民间流传，整合、分流、演化、变异为汉人的想象空间和精神世界，能够对秦汉基于

“大传统”的庙堂文学与基于“小传统”的民间文学的二元格局进行整体观照，弥合某些支离破碎的描述，更为立体地勾勒出想象空间和精神生活对于秦汉、魏晋文学演进的作用方式。

第三，在研究服务于制度的文体形成、流变时，既重视文体的内在延续，又要分析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浸润，还要分析文体风格、样式、语言等要素的演进规律，力争更为妥帖地总结出秦汉文体演进的轨迹。制度需要文化作为精神支撑，文化需要制度作为行政保证。先秦出于自发的文学创作和缺少理论支撑的制度建构，随着儒家学说的完善和行政实践的积累，在秦汉逐渐融合，文学活动被纳入国家建构的视角下全新审视和重新定位。先秦文学传统对制度建构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在彼此互动中完成了对文学的改造和创新。在这其中，重点讨论文学如何作用于制度，制度如何保障并要求文学参与，文学在帝制建构和行政活动中如何运作。秦汉逐渐完善的公文制度，使得颂、赞、书、论、箴、铭、碑、诔等文体得以形成，并不断约定俗成，随着行政效率和政治文化的需求而强化其形式、结构与风格。作为外部形态的礼制，通过礼乐精神、文化教养和社会观念浸入到政治学说和行政秩序中，国家制度和行政运作所需求、所衍生出来的文学价值论、文本结构论、文章风尚论和艺术审美论，成为“制度文学”系统而持久的要求，对秦汉文学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促进了文学格局中主流价值、主体意识和主导倾向的形成。

第四，在行政批判、社会情绪与文学基调的研究中，侧重于文本分析和史料考辨，对秦汉重要的典籍创作指向和作者的社会干预意识进行分析，由点到面，采用归纳法阐述秦汉著述的基本用意及其对中国文学基调的作用方式。秦汉精神世界由官方的“大传统”与非官方的基于民间信仰的“小传统”汇融而成，以两者间的互补和互动作为切入点，讨论社会管理对社会认知、民间信仰、文化心态的作用方式，描绘道教形成和佛教初入时期秦汉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想象世界，讨论这些思想、观念、学说的演变轨迹及其诠释的逻辑结构，审视其对文学思想、观念的滋养和塑造。分析源自社会思潮的文学认知，在想象世界和精神生活的驱动下是如何转化、衍化和分化，并对神话、小说、辞赋、诗歌中相关题材的叙述方式、建构特征、表现逻辑、语言习惯进行系统总结，从精神生活史的角度分析文学认知的变动过程。

三 基本观点

本书以“秦汉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格局之初成”为基本视角，从如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分析帝道学说如何主导了秦汉政治秩序的建构与调整。从商鞅与秦孝公的对谈可以看出，帝道学说是与王道、霸道并列的学说之一，其学理源自对天帝的崇拜，因附益五帝传说而被视为一种治道。秦在对天帝的祭祀和对五帝功业的效法中，持续以建立帝业作为追求，并由此确立了秦行帝制的基本形态。帝道学说的渊源在于遵从天帝、思服天道，以“体道”为学理依据，以“道不变，法亦不变”为旨归，注重因循自然、无为而治，此同于老子之学，因其以黄帝为代表，汉初遂将二者合称为“黄老”之学。帝道学说推崇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秦汉在对黄帝进行重塑时，强化了黄帝利用阴阳刑德治理天下的特征。秦朝依照阴阳刑德思想确定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庆赏刑德论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运行所带来的灾异祥瑞观察政治秩序的运行。学术界习惯将汉宣帝所谓的“霸王道”解释为“霸道和王道”的融通，然从史料考证，先秦学者已经意识到霸道、王道不可独行，开始分析二者之别，并试图融合二者之长，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霸王之道”，便是兼容了力政与德政的优长，成为秦汉“帝王之道”形成的学理来源。

第二，阐释了两汉儒生对周制的接受、对秦制的反思中逐渐形成的改制思潮。王道学说的历史起点是先王之道，而学理指向为外王之道。周秦学者在探讨王道的实现时，提出了以“法先王、法圣王”为要求的王制论，孔子立足先王之制，从中总结先王之道；孟子依据外王之道，追述古圣王之制；荀子则以圣王之道，提出后王之制的建构。秦汉儒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先王之制为经验、以王道学说为依据、以圣王之制为指向的王制学说，成为秦汉改制的理论支撑。秦统一六国前的政策，曾得到孔子、荀子、司马迁的充分赞扬，然其统一六国之后，未及遐迩，便很快亡国。汉初的过秦诸论，对其骤亡的原因，有仁义不施、攻守异术、不行礼义等诸多论述。从社会动因来看，其以峻急之法行郡县，彻底打破了分封制所形成的六国贵族的利益。从文化动因来看，秦汉间多言“秦弃礼义”，实以周礼传统审视秦礼。其实秦有仪法，且其多杂戎狄传统，兼采

六国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周秦礼制因时势演化，周以礼作为治国精神，秦视礼为行政手段，二者秉持不同，形制迥异，但秦重礼法而不重礼义，使得秦法失去了内在的道德约束，显得刻薄寡恩。

两汉儒生在汉承秦制的过程中，不断从学理和实践中推动汉制的调整，并期望通过述旧制、明王制等方式推动改制，从而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改制思潮，最高潮是为王莽托古改制而建立新朝。在西汉不断强化的改制语境中，赋家在大赋结尾处，总希望以天子自省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汉制建构的理解。西汉辞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正在于赋家在结尾处的讽谏，常常蹈入西汉所形成的改制语境之中，其见解既不能独到，其学理亦不能标新，并不能超出时人的政治见解，其卒章所显之志更多接近于政治套语，从而使得汉赋的劝谏失去了针对性和有效性，被视为陈陈相因之辞。

第三，讨论义政学说如何影响了秦汉社会共识的确立，并成为秦汉士风、文风变化的学理依据。道义是基于天地秩序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理解，义政是基于社会运行规则而提出的行政学说，其要求君臣上下服从于社会的道德共识、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相对于仁政，其侧重强调国君对天下的责任和义务、强化民众对社会道义的谨守和遵从，因而成为周秦诸子对公共秩序理解的学说基点，成为秦汉帝制建构的理论来源之一。

由周秦义政论发展而来的义兵说，得到了包括兵家在内的诸子的认同，成为对秦汉军事行为合法性进行阐释的理据。特别是《吕氏春秋》所倡导的义兵论，是强秦统一六国的有力依据；刘邦为义帝发丧，成为楚汉之争的军事转折点；西汉在处理民族军争时，仍以“义”为基本策略，将华夷之防转化为华夷共存，形成了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地缘政治观。

西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义观，确立了衡量历史得失、国家意志、行政措施的标尺：一在于董仲舒从天人关系上，对天道和人道运行的本质要求进行凝练，形成了政治道义观；二在于司马迁从历史经验上，对历史运行秩序的重构，使“义”成为观察历史秩序的参照，形成了历史道义观；三在于盐铁辩论从行政理念的角度，对西汉制度进行了讨论，使得参与讨论的御史、大夫们意识到国家必须承担起社会道义，才能长治久安，初步讨论了国家道义观。

第四，讨论社会情绪与两汉文学创作的关系。秦汉之际强调“义”的公共性，就在于肯定了“义”作为调整公共关系的学理，是维系社会

秩序的最大公约数，其理论阐释和运行规则应由深通人之为人、人之能群的君子来制定。《淮南子》中提出的“君子制义”，强化了士阶层对政治行为和社会事务进行评鹭的话语权。以此为理论基点，两汉学者不断强化“义行”的示范性，将之作为理想人格最重要的品质；当东汉朝野发生冲突时，士人坚守“行义”“守义”的认知，以公共舆论对抗权贵意志，坚守士人对社会公义的责任。

秦汉时期不断强化的“公天下”，促进了士大夫对天下事务的自觉承担，也吸引了大量士人入仕。但当天下秩序不能按照朝野预设的共同想象发展时，“再受命”便成为调和王室与天命关系的基本学说，一度成为西汉调整国家秩序的主要方式，并强调是在刘姓王室之内的调整。但当这些调整不能有效实现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转，异姓称帝的禅让学说便成为调整国家秩序的新方式，王莽和曹丕代汉正是因这样的理解而实现。

刘邦立汉时所宣称的“天下共治”，成为两汉选贤机制的根源。每逢灾异而选拔直言极谏、贤良文学等，最初是主动以朝野对话来纾解民间积怨，以作为调整行政措施的参考，并成为两汉的行政惯例。在两汉行政实践中，一方面直言极谏的制度仍在，其作用却在不断淡化、弱化；另一方面两汉文人却坚守天下的责任，秉持着直言的传统，为了引起朝廷对意见的重视，不断强化直言的力度与强度，使得两汉政论散文的批评愈加尖锐。随着两汉士人从行政的参与者转化为旁观者，西汉政论多为建构式的策略，而东汉散文多为批评式的指责。

第五，考察了文学制度对文学群体形成的促进作用。秦始设文学之职，以掌文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经公孙弘与孔臧提议，遂为博士置弟子、受业如弟子，岁试以为文学掌故，品秩一百石，为朝廷二千石、内郡守属员，目的在于使明布谕下之文书能“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西汉文学职务的设立，既强化了文书的义理、考证、辞章，使之更具有文学性；也促成了官员的文学修养，成为两汉文学形成的制度保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后，博士弟子补为吏员的考试由射策改为明经，并将其成绩合并为甲乙科，由太常主持，与丞相主持的意在选拔官员的四科取士相补充。随着甲乙科录取人数的增多，东汉吏员中的文学职务越来越多，这不仅促进了文学群体的形成，而且也促成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自汉武帝下令郡国各修文学之后，郡国文学便逐渐承担起两汉经学教育、礼乐教化和文学创作的职能，在西汉多作为儒生学习之处，在东汉则成为文

士交流之所，逐渐形成州郡学术活动中心，促进了两汉文学群体的形成。特别是建安年间，曹操下令郡县普遍设置文学，文学群体迅速扩大，创作日益增广，这成为魏晋文学繁荣的制度动因。

鸿都本为东汉藏书之所，汉灵帝即位后在鸿都门设待诏，以辞赋、书画等技艺相招。后出于校订经书的需要，遂置鸿都门学。汉灵帝不通过东汉官吏选任机制，开卖官鬻爵之路，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地方高官，此被后世称为鸿都门榜。蔡邕、杨赐、阳球等人上书反对的是鸿都门榜，而非鸿都、鸿都门学本身，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历史误读。

第六，辨析了秦汉文学认知对文学思想的推动方式。孔门四科之“文学”，常被视为“文学”的概念形成，然详细考证，可知孔门所谓“文学”，多指的是礼学，是对文治之道、礼乐之法的概括。与之相关的“文章”一词，指的是礼仪制度。荀子所倡之“积文学”，强调的正是人文化过程。墨子出于对礼乐的抵触，将“文学”限定为典籍或著述，指向了后世“文章”的含义。韩非子对“文学”的排斥，也是出于对文学修饰性的清醒认知，而主动采取的行政策略。

两汉是文学教化理论形成的时期，先秦诸子的教化观念，在秦汉之际日渐成为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共识，在两汉的政治理论和行政实践中不断被强化，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深入的推广。在此背景下，经学教化与文学教化观念相互作用，也成为文学担负社会功能的基本要求，成为诗歌、辞赋、散文创作的理论动因。如果我们视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两汉特别是东汉的文学认知与文学实践，便是量变式的积累阶段。

汉赋所形成的“劝百讽一”，其责任不在赋家，而在于两汉文学的讽诵之法和讽谏机制。一是用于君臣交流的讽与诵，在秦汉时期演化为诵读，其内在的讽喻性被削弱，逐渐成为一种语言技巧。二是讽诵之法为倡优习用，两汉赋家作赋时身份卑微，其所诵之赋，只被视为调笑之辞，不被视为正式的政见之论。三是两汉采用的五种劝谏机制，讽谏最为含蓄委婉，相比于政论而言，其论政力量最弱，很难得到君主的重视。两汉间对文学表意功能的探讨，文章撰述更加重视技法，使文学与经学重义理的表述手法有了分野；东汉不断强化作家的属文著述技能，并主动要求以文传世，促成了作家的个体自觉；在民间文人创作风气的影响下，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汉献帝提倡著述、三曹雅好文学，使得文章著述成为朝野共同

崇尚的文化活动。

第七，分析了知识视阈对文学形态的影响。通过想象对文学空间进行建构，使得文学摆脱写实而形成独特的叙述策略，这其中对异域空间的虚构、对历史过程的重塑和对叙事肌理的强化，使得文学的叙述立足于真实却超越了真实，建构了秦汉文学的空间结构。作为文学想象，熟悉的陌生化和陌生的熟悉化不仅是秦汉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也是文学作品建构的主要模式。

谶纬是两汉儒学神学化的产物，其作为一种文化认知，支配了两汉学术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模式，成为思考天、地、人互动关系的基本维度，丰富了两汉想象空间的多元性，通过神化帝王、圣人等形象，对历史进行了艺术想象，实现了古史的神化和神话的历史化，并对自然感物和人心应物等艺术机制进行思考，促成了汉魏六朝物感说的成型。

艺术境界体现的是创作主体对艺术创作形态的主观感知，以什么样的审美愉悦来对待文学作品形成的艺术效果，不仅考量着一个时代艺术品位的高下，而且影响着这个时代艺术生产的主导倾向。《古诗十九首》所形成的浑雅之美，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天成之趣；曹丕诗歌所开启的清怨之美，既是建安风骨的余响，也是六朝诗风的先声；曹植诗歌所体现的天工之美，既是对传统诗歌创作方法的直接继承，又是对汉魏辞赋创作重思力的反拨，为六朝天工、思力两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做了经验的积累。

第八，讨论了文学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骚体为两汉辞赋的重要形式，汉人不仅拟楚骚作辞，而且不断推动骚体的新变：通过骚体句式的散化，使散体大赋注重抒情性和音韵美；通过减省“兮”字，促成了三言诗、七言诗，完成了骚体的诗化；广泛采用减省“兮”字的四言、六言句式，在推动骚体赋向小赋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骈赋的形成。先秦诗歌主要是合乐的“歌诗”，有着特定的演唱形式。由于《诗经》《楚辞》等音乐形式的失传和两汉音乐创作的衰落，这种合乐演唱的文学传播形式在两汉逐渐衰微，而不得不采用“不歌而诵”的赋法进行传播。

汉魏之际，诵读方式被引入到诗歌的传播中，从外部促进了诗歌与音乐的分离，从而使诗歌不再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而成为具有独特艺术品位的文人诗。汉赋作者接受了诗教理论，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和评论，实际是对先秦诗歌传统的延续。汉赋使诵读成为文学交流的主要模式，从而促进了诗歌从音乐和舞蹈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